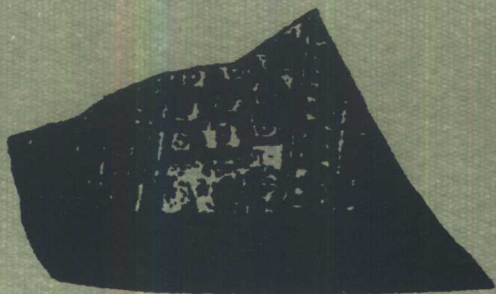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WORLD CLASSICS ON EUR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荷兰] J.E. 范·洛惠泽恩-德·黎乌 著

许建英 贾建飞 译

斯基泰时期

——一种对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印度北部的
历史、艺术、铭文及古文字学的研究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基泰时期/(荷兰)J.E. 范·洛惠泽恩-德·黎乌著;许建英,贾建飞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ISBN 7-222-03344-0

I. 斯... II. ①黎...②许...③贾... III. 佛教—宗教艺术—研究—印度—古代 IV. J135.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6505 号

根据 1949 年印于荷兰的文本译出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斯基泰时期

著 者 [荷兰]J.E. 范·洛惠泽恩-德·黎乌

译 者 许建英 贾建飞

总 策 划 林 祥 胡廷武

主 编 余太山

副 主 编 张 立

责任编辑 王小燕

封面设计 鞠洪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出版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mm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刷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7-222-03344-0/K·313

定 价 45.00 元

译者的话

我们知道,古代印度北部和西北部不仅是佛教发展与传播的重要地方,而且还是传播广泛、影响久远的佛教艺术的滥觞之地。著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和秣菟罗佛教艺术即产生于此地。而为研究此地佛教艺术的产生、发展和衰微,以及它们和希腊古典艺术的关系,曾吸引了一大批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艺术家、铭文学家、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解决了许多有关方面的问题,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引人瞩目,如约翰·马歇尔、格伦威德尔、阿尔弗莱德·福色尔和科诺等。但是,无庸讳言,仍有诸多问题难以解决,陷入了长期的争论,也提出了种种假设和理论,诸如印度北部及西北部佛教艺术的起源,佛像的起源,所形成的艺术流派,印度本土艺术和古希腊艺术的关系及其对佛教艺术的影响,以及当地复杂的民族斗争、王朝更迭和佛教发展的关系等。在早期的研究中,关注犍陀罗考古及佛教艺术的较多,而较少研究并注意到秣菟罗佛教艺术及其和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关系。有鉴于此,本书作者独辟蹊径,试图通过与犍陀罗佛教艺术同时繁荣的另一个佛教艺术中心——秣菟罗的研究,说明秣菟罗艺术在印度北部和西北部佛教艺术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有用的线索。

作者是通过研究斯基泰统治秣菟罗时期的纪元入手来结构本书的。斯基泰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人认为就是西方史籍中的萨迦,也可能就是我国古代典籍中提到的塞种。对于斯基泰人的起源、分布和族属等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都有较大分歧。它们的主要起源地似乎在锡尔河以北,西伯利亚以南的广大草原

地带,后来经过四处迁徙,分布地域更广,东到中国的河西走廊地区,西到第聂伯河流域。斯基泰人曾在公元前1世纪征服印度北部及西北部地区,并在此统治了一个多世纪。这一时期的纪元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存在较大的分歧,而该期又是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只有确定有关纪元,才能详细判别犍陀罗、秣菟罗佛教艺术在各相应历史时期的特点,弄清其发展史的脉络。作者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铭文资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纪元系统。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犍陀罗和秣菟罗这两个重要的佛教艺术中心进行了研究和对比。

犍陀罗,是一个古代地名,指的是印度河西岸,包括今天的白沙瓦谷地及斯瓦特、巴奈和巴爵尔。犍陀罗地处印度和西亚的边境地区,历史上曾有多民族占领并统治过此地。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它是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一部分。在公元前4世纪,它曾被亚历山大大帝占领了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后它被旃陀罗笈多建立的孔雀王朝征服,但是一个世纪之后西方又重新占据了它。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希腊人又统治了此地。在公元前1世纪早期,斯基泰人进入这一地区,一个世纪之后帕提亚人与贵霜人又接踵而来。从那以后,这一地区不停地被外来民族所征占。公元3世纪,犍陀罗被新兴的萨珊王朝所统治。公元4世纪,占领该地的是寄多罗贵霜。最后,在公元5世纪中叶,哒人或白匈奴席卷这一地区,不少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哒人的烧杀掠夺,使犍陀罗繁荣受到致命的打击。关于犍陀罗艺术,人们对其中北部犍陀罗佛教艺术是否深受希腊和罗马的影响争论不休。

作者认为,在斯基泰人统治印度北部、西北部的时期,它们从希腊化时期的西方复制并输入了许多艺术品。在输入或复制希腊艺术品的过程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使当地的艺术获得了一种冲动,这种冲动使后来著名的犍陀罗艺术蹒跚起步。要准确确

定犍陀罗艺术的始点固然非常困难,而要精确判定犍陀罗艺术的终点同样不易,要弄清楚哪一件雕刻可算作犍陀罗艺术而不再是希腊艺术的输入品或复制品则更为困难。这里肯定存在着一个过渡期,在此期间制作复制品逐渐减少,因为犍陀罗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有了自己的艺术观点和自成一格的图案,尽管它们从希腊经典作品中受益良多。这一过渡期,可能开始于帕提亚诸王时代,而在卡德菲斯君主统治时候得以继续,在迦腻色迦统治时虽然仍有相当强的希腊影响,但是犍陀罗艺术可能已经得到巨大的发展。这种新兴的艺术毫无疑问受到了迦腻色迦的保护和促进,这一过程大约持续半个世纪,最后才形成了一种富有特色的独立的艺术。

作者则认为,犍陀罗艺术在观念上是源于印度本土艺术,而印度本土艺术则产生于巴尔胡特和山奇的先前的阶段。在经过详实的论证后,作者指出:印度本土艺术对犍陀罗的影响比迄今为止一般所认为的更大,西方影响则比一般的推测要小,特别是在公元后的几个世纪里。在犍陀罗艺术的黄金时代,几乎看不到西方的直接影响。

秣菟罗在印度的西北部,和犍陀罗一样,是个古代名字,现在称为穆特拉。它坐落在朱木拿河之滨,同时它又刚好处在从印度西北部到恒河平原的商业通道上。早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初,秣菟罗可能已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了。既然此地非常有利于贸易,不久就变得非常繁华,成为一个商业中心。人们四处经商,但是他们不论在哪儿获得钱财都能用于艺术的奢华。这座商业城镇就这样逐渐成为著名的艺术中心。除此之外,秣菟罗一度是苏罗婆国和般遮罗国的所在地,因此有足够的理由期望该地区遗存有很早期的印度艺术品。作者认为,在此发掘出的药叉雕像便源自秣菟罗的最古老的印度艺术品。而且该地还发现了巽迦时代及其以后的艺术品。秣菟罗不但是保持商业持续兴旺的中心,而且也

是维持艺术持续繁荣的中心,它的声名远播西方。作者对秣菟罗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作了全面的研究和论述,对秣菟罗艺术的特点进行了总结。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耆那教圣人像和佛陀像做了对比研究,这为研究佛像的起源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考。

此外,作者还对公元3世纪的后贵霜的历史、佛教艺术和铭文进行了综合的、深入的考察。这样就使我们能够比较系统地了解一度中断的斯基泰时期的印度北部和西北部的情况。

总之,作者从考古学、历史学、铭文学及艺术史学等多方面,对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印度北部进行了全面的综合研究。它不仅是研究秣菟罗的不可多得的重要著作,而且也为研究犍陀罗的历史、佛教艺术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

本书作者J.E. 范·洛惠泽恩-德·黎乌女士是荷兰人,先后在荷兰莱顿大学和乌德列支大学学习和从事研究工作,曾师从沃格尔教授、克罗姆教授、库帕教授、弗利德曼教授、博什教授和高恩达教授学习印度考古、梵文、巴利语并获得有关的专业训练,而且在荷兰教育、艺术和科学部及英国大学妇女基金会的资助下得到到奥斯陆、伦敦和巴黎访学,广泛地收集资料,访问所研究领域的专家,进行有关的探讨。同时在有关外文资料的运用上,作者也不拘泥于既有的解释与翻译,例如在汉文和日文资料的利用上,作者就显示出审慎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研究作风。在印度北部和西北部历史、艺术和考古的研究领域中,该书以其独特的视角、独到的见解和独有的风格而独树一帜。近些年国内已经译介了不少关于犍陀罗方面的著作,而此书将会为我们从整体上综合地了解印度北部和西北部提供更有益的帮助。

本书译本是根据1949年印于荷兰的文本翻译的,原书名为《“斯基泰”时代——一种对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印度北部的历史、艺术、铭文及古文字学的研究》。

本书的汉译是协作完成的:前言、引言、正文的第一章、第二

章、第三章以及译者的话是由许建英承担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是由贾建飞执笔的；附录等是两人联合完成的。本书除了涉及大量的历史、考古、佛教及铭文知识外，还有德语、法语、古希腊语等多种语言的引文，刘文锁博士、张绪山博士等在这些引文的翻译上给予了热情的帮助，我们在此深表感谢。尽管我们全力以赴，但是由于该书涉及内容极其广泛和复杂，诸多地方仍是我们学力所不逮，加上时间紧迫，参考资料有限，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2001 年 8 月

名誉顾问 季羨林

总顾问 李学勤

学术委员 定宜庄

厉声

荣新江

徐文堪

林祥

余太山

张立

耿昇

林梅村

芮传明

于志勇

胡廷武

龚缨晏

林悟殊

王邦维

张绪山

韩昇

刘迎胜

王颀

华涛

牛汝极

王希隆

蓝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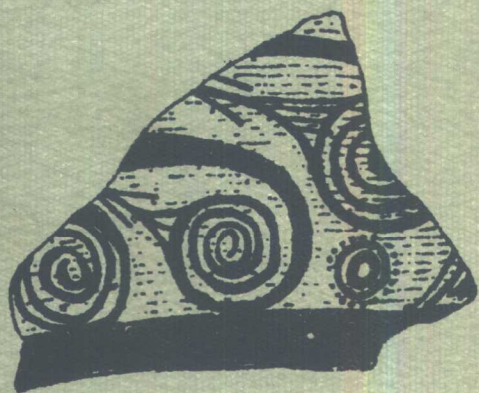
潘志平

巫新华

总策划

主编

副主编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前 言	(1)
引 言	(1)
第一章 纪元	(3)
第二章 印度西北部的艺术	(71)
第三章 秣菟罗贵霜艺术中的佛陀和耆那教圣人像	(135)
第四章 秣菟罗的后贵霜艺术	(210)
第五章 后贵霜时代的婆罗迷文铭文	(239)
第六章 后贵霜时代的历史	(277)
第七章 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3 世纪印度北部的历史	(297)
附表一 “斯基泰”时代的诸统治者	(358)
附表二 “斯基泰”时代的铭文	(360)
附表三 婆罗迷铭文中的字符 ku	(363)
附表四 婆罗迷写本中的字符 u	(364)
图版说明	(365)
译名对照表	(368)

引言

当对印度北部得以熟悉的时候,可见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在置身于犍陀罗艺术的学者中考古学家为数良多。特别是佛像的起源及其古代性似乎对这类学者有着持久的魅力。从印度考古需要的观点来看,就这一主题带来的认识似乎是值得推荐的。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对其他的同时繁荣的艺术中心秣菟罗进行全面的研究,这些问题就不能得到合适的解决。

和所有这些相联系的第二个要求是纪元问题的解决。从科诺教授的观点出发,在研究中我们被迫进入改变我们观点的资料。蒂尔教授在他的就职演讲中正确地评论道:“……年轻的一代总是用不同于他们前一代的眼光看问题”。并且,“……甚至那些著名的、颇多研究的材料仍有新东西,如果研究者知道他正在寻找什么,并能够运用其独立的判断的话。”

不过,即使在将来,我们关于纪元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哪怕如此,我们所表明的纪元序列将仍有其价值;正如我们所勾画出的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发展线索一样。

为了避免结论,当我们计算旧纪元的年代时,我们已经循着班纳吉、巴赫霍夫及其他人的体系。不过,我们意识到在基督纪元后的年代上增加一年将会更正确。

关于在第4章、第5章和第6章中所讨论的铭文,希望我们对它们的释读和翻译要比已经刊布的有所提高。在我们的翻译中,都是按它们在原文中的情况给出的,置于括号中的则是不确定的;而加个问号则表明是一个补充性建议;万一某处对一个 aksara 有

两种可能的释读,那么第二种就放在括号里,并且加个“或者”。关于汉文文献段落,我们参考了已存在的翻译,但是这些都没有刻板地引用,因为我们对它们进行了重译。

第一章 纪 元

关于这些纪元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迦腻色迦王(Kaniṣka)及其继任者统治下的时期已经习以为常的这一纪元,对任何进一步探讨印度北部早期历史问题都一直是个阻碍。明确确定这些纪元的始点,艺术史也会极大受益,因为那样的话,所有被确定为贵霜(Kusāna)和后贵霜(Post – Kusāna)时代的雕刻就会得以详细标明,这样我们能够对秣菟罗(Mathurā)艺术源于贵霜(Kusāna art)艺术,经历后贵霜艺术到笈多时代(Gupta time)的发展有一个相当完整的考察。

不过,不仅秣菟罗和笈多艺术(简言之,印度北部艺术)受益于此,而且如果我们知道所使用纪元的起点的话,我们便能够得出若干关于印度西北部艺术——即犍陀罗(Gandhāra)艺术——年代更为确定的结论,因为所提及的这一流派中的若干雕刻带有年代。迄今为止,有关印度西北部艺术的最为矛盾之诸多假说已广为传播,而没有一个能举出证明其正确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因为,我们在下面将会进一步看到,这一问题和迦腻色迦王何年开始其统治的问题密切相关。

直到今天,尚未就此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而且“还没找到能广为接受的解决办法^①”。

1874年,爱德华·托马斯(Edwar Thomas)^②建议把迦腻色迦王纪元看作始于公元前312年的塞琉西纪元(Seleucidian era)(或者看作始于公元前248年的安息纪元(Parthian),迦腻色迦王及其继

任者治内数以百计的日子被略掉了,这样人们肯定会把 3~98 年看成塞琉西纪元的 303~398 = 公元前 9 年~公元 86 年(或者看作安息纪元的 203~298 = 公元前 45 年~公元 50 年)。

卡宁汉姆(Cunningham)最初认为,迦腻色迦王及其继任者时代的那些年代一定要被归于始于公元前 57 年的超日纪元(Vikrama era),后来他同意应归到塞琉西纪元^③。

沃格尔(Vogel)^④认为出土于犍陀罗的不同雕像上的年代,尤其是罗里延·唐盖(Loriyan Tangai)、迦玛尔嘎里(Jamalgarhri)上的那些,以及喀什特纳嘎尔(Hashtnagar)佛像垫座及斯卡拉·德里(Skarah Dheri)的佛像使用的都是同一纪元。

布勒(Bühler)^⑤则在卡宁汉姆的观点和以下的这种可能性之间拿不定主意:即迦腻色迦王朝的年代和那个出土于坦叉始罗(Taxila)的标有纪元不明的 78 年铜盘一起,要被划归于一个在阿莫西尼的 āyā gapata 上标明的纪元不明的 72 年的纪元中去^⑥。

温森特·史密斯(Vincent Smith)建议用始于公元前 49 年或公元前 48 年的安条克的恺撒纪元(Caesarean era)确定塔克特-伊-巴喜(Takht-I-Bahi)^⑦铭文年代的可能性。在预先假定略去数百和数千的情况下,温森特·史密斯也证明使用 Saptarsi 纪元或者 Laukika 纪元^⑧,其中表示 100 和 1000 的数字也省去了^⑨。格罗斯(Growse)已经于 1877 年提出了这种解决方法^⑩。

塞尔文·列维(Sylvain Lévi)认为迦腻色迦纪元大约始于公元前 50 年左右^⑪。

班纳吉(Banerji)^⑫和福色尔(Foucher)^⑬认为可以把始于公元前 322 年的孔雀王朝纪元(Maurya era)作为迦腻色迦“登基”的日期,这样同样地把数百年省去了。

还有许多其他的纪元被引入到所讨论的这一领域。布勒建议一个始点在公元前 137 年和公元前 112 年之间的纪元^⑭;马歇尔据出土于坦叉始罗的铜盘提议一个由毛迦(Moga)可能于公元前 95

年^⑮建立的纪元;班纳吉提出由乌奴你思(Vonones)于公元前100年^⑯建立的一个纪元;拉普森(Rapson)推出一个大约始于公元前150年左右的纪元^⑰;加雅斯瓦尔(Jayaswal)建议一个始于公元前120年的纪元^⑱,塔恩(Tarn)则假定一个始于公元前155年的纪元^⑲。卡宁汉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主张把迦腻色迦王朝和始于公元前57年的超日纪元(Vikrama era)统一起来,对此假定弗里特(Fleet)^⑳、弗兰克(Franke)^㉑、路德斯(Lüders)^㉒、肯尼迪(Kennedy)^㉓和巴奈特(Barnett)^㉔都给予有力支持。道森(Dowson)特地把超日纪元用于塔克提-伊-巴喜出土的铭文上^㉕。马歇尔认为该时代被用于134和136的铭文^㉖中。最近,马嘉姆达(Majumdar)提议这一纪元适用于罗里延·唐盖、哈什特纳嘎尔及斯卡拉·德里出土的铭文^㉗。格什曼(Ghirshman)提议把它作为所有较古老的迦罗西蒂文(Kharosthi)铭文中实际使用的纪元^㉘,他建议把公元144年作为迦腻色迦统治的起点,这是昙叉始罗铭文的一个单独的莫俄斯纪元(Maues era)。

弗噶森(Fergusson)最初同意卡宁汉姆关于迦腻色迦于公元1世纪初兴盛之说^㉙,后来他改变了主意,把迦腻色迦纪元的始点定于公元78年,以便该时代能因此和塞种(Śaka)纪元重合,二者完全相同^㉚。奥尔登伯格(Oldenberg)赞同他的观点^㉛,但是后来^㉜,他支持博叶(Boyer),博叶认为迦腻色迦是于公元90年登基的^㉝。

巴恩达卡(Bhandarkar)不仅把迦腻色迦及其继任者的铭文归于塞种纪元,而且把所有其他迦罗西蒂文铭文都归于塞种纪元。在迦腻色迦“登基”铭文的年代上,他认为始终略去了200,这样迦腻色迦生活在大约公元278年^㉞。他提出乌奴你思^㉟应该是塞种纪元的奠基者;而包·达吉(Bhau Daji)^㊱、博叶^㊲和弗里特则认为是纳哈帕纳(Nahapāna)^㊳,焦维奥-杜波莱伊尔(Jouveau-Dubreuil)又认为是总督(Castana)^㊴。

科诺(Konow)在他的《印度铭文汇编》中的观点是迦罗西蒂铭

文中并没有使用塞种纪元,而是阎膏珍(Wima Kadphises)^④引入了它;根据他的观点,迦腻色迦统治始于公元 127~128 年。后来,他改变了该日期,而认为应当是公元 130 年。最近,他认为应更晚一点,甚至在公元 138 年左右^⑤。

拉普森和加雅斯瓦尔在科诺就此问题发表大量文章后是为数极少的几个,仍坚持认为迦腻色迦是塞种纪元的奠基者。

就目前而言,在过多的假设和理论中,由于科诺的观点总体上作为最权威的而被接受,因此需对它进行更详细的审查。

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一主题错综复杂,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科诺并没清楚表明他们的通常有点无可置疑的声明是基于什么之上,关于这些用于基督纪元开始前后几个世纪的纪元,科诺所建构的理论和假说总是互为依赖,(开始时)真正要从这一理论和假说的迷雾中找到路途是困难的。

不过,这一始点在由约翰·马歇尔伯爵在咀叉始罗发现的一个银质涡旋形装饰图等的铭文上。我们在此根据马歇尔的解读、翻译以及后来由科诺对几处修正后的全文引述如下:

1. “Sa 1 100 20 10 4 1 1 ayasa aśhādasa masasa divase 10 4 1 isa diva(se pradi)stavita bhagavato dhatu(o) Ura(sa) -

2. keṇa (Im) taviṛiapatraṇa Bahaliṇa Noachae ṇagare vastavena Tenā ime pradistavita bhagavato dhatuo dhamara -

3. Īe Takshasi(la)e taṇuvae bosī[dhi] satvagahamī maharajasa rajatarajasa devaputrasa Khushaṇasa arogadakhīṇae

4. Sarva(bu) dhāṇa puyae prach(e) gabhudhāṇa puyae araha(ta)ṇa pu(ya)e sarvasa(tva)ṇa puyae matapitu puyae mitramachanātisa -

5. Lohi(ta)ṇa (pu)yae atvaṇa arogadakhīṇae Nivāṇae hotu a(ya) de samaparichago”.

译文为:

“Anno 136, 在第一个月 Āśhādha 的第 15 天,在这一天上帝的

遗体由 Urasaka 安置, Urasaka 是 Intavhria 男孩之一, 大夏人, Noacha 镇 的居民。由他, 上帝的遗体被安置在他自己的菩萨小教堂中, 该教堂在 Takshasila 的达摩罗吉珂 (Dhamarājika) 院子中, 为使伟大的王, 万王之王, 上天之子, 贵霜身体健康, 为向所有佛陀表示敬意, 为向 Pratyē Kabudhas 表示敬意, 为向阿罗汉 (Arhats) 表示敬意, 为向万物表示敬意, 为向父母表示敬意, 为向朋友们、大臣们、族人们和亲戚们, 为了祈健康于他本人。

愿你的这种得当的慷慨通达涅槃^{④2}”。

马歇尔和科诺之间的巨大分歧在于对 *ayasa* 一词的理解。马歇尔把这一词理解为名字阿泽斯 (Azes) 的所有格, 因为在该铭文中, 提到 a mahārāja rājatirāja devaputra Kuṣāṇa, 而且由于阿泽斯所有头衔都没有, 那么根据马歇尔的观点, 他不可能是当时的统治君主。因此马歇尔解释那则铭文开头出现那个名字是这样假设的: 这则铭文所标年代的纪元是由阿泽斯建立的, 而阿泽斯的所有格并不表示他统治的那个年头, 而是指他所建立的纪元^{④3}。而且, 这一假设的阿泽斯纪元正是超日纪元。

科诺起初同意马歇尔的说法, 只是他认为当该铭文发布时, 阿泽斯仍在行使统治, 就是说他仍是诺阿卡 (Noaca) 之王^{④4}。后来科诺提出反对, 首先, 没有其他的例子可以足以证明这样一个阿泽斯纪元。弗里特已经“特别”声明^{④5}, 当时肯定有两套纪年系统并用, 它们显然互相重叠, 即所假定的阿泽斯纪元和用于此期其他的迦逻西蒂文铭文的纪元系统。

按照科诺的说法, 主要的异议是如下事实: 在该种情况里, 提到一位君主的名字及其年代, 在此铭文题写之时他并不在位。不过在较古老的迦逻西蒂铭文中, 把某君王的名字以属格的形式附加到该年代上是习以为常的事, 以此表明那人是当时的统治君主^{④6}。

因此, 科诺提议以不同的方式译释 *ayasa* 这个字, 实际上把它

认作 *aśadaśa* 一字的形容词。

根据他的解释, *ayasa* 可能是由梵文 *adyasya* 经由 *ajja* 衍变而来的, 其变化如下:

$$\begin{array}{l} > \text{adiyasa} \\ \bar{\text{adyasya}} \text{ via } \bar{\text{ajja}}: \bar{\text{adyasya}} > \text{ajjasa} > \begin{cases} \bar{\text{ajasa}} \\ \bar{\text{ayasa}}^{47} \end{cases} \end{array}$$

这一点的意义肯定是在有异议的这一年有两个月 $\bar{\text{Āśāḍha}}$, 其中一个被表明作为第一个 $\bar{\text{Āśāḍha}}$ ⁴⁸。这种情况在印度历法中发生的非常少。在科诺的要求下, 范·威克(Van Wijk)根据当时可能使用的悉昙多(*Siddhantas*)的规则, 在公元 48 年至公元 78 年之间, 此事只能发生在公元 52 年和公元 71 年⁴⁹。该界限是由科诺给定的。因为根据他的说法这些铭文不会迟于公元 78 年, 所标年代的纪元不会始于公元前 88 年。按科诺的意见, 联系到坦叉始罗的铜盘, 以及阿莫西尼还愿匾上的铭文, 范·威克指出在这两个可能性中, 公元 52 年更合适, 所以用在以较古老的迦逻西蒂铭文中的纪元始于公元前 84 ~ 公元前 83 年。

为确定迦腻色迦纪元的起点, 科诺以同样的方法利用迦腻色迦及其继承者一些铭文上的几则天文学的说明。

在泽达(Zeda)发现的铭文注明的日期如下: “*Sam̐ 10 1 asadasa masasa di 20 utaraphagunē*”⁵⁰ (11 年, 在 *Uttaraphālgunī* 的 $\bar{\text{Āśāḍha}}$ 月的第 20 天。) $\bar{\text{Āśāḍha}}$ 的第 20 天和 *naksatra Uttaraphālgunī* 相一致是非常偶然的。除此之外, 在乌恩德(*Uṇḍ*)铭文中, 提及下列日期: “*Sam̐ 20 20 20 1 cetrasa mahal(sa)sa divase athami di 4 4 ísa kṣunamis(vi)rana kha……purvaśade*”⁵¹ (“61 年, 在 *Purvaśāḍha Caitra* 月的第 8 天, d.8.), 这样在此 *nakṣatra Pūrvaśāḍha* 和 *Caitra* 月的第 8 天又巧合。

范·威克为科诺计算何年为迦腻色迦纪元的第一年, 如果上面